



【顺其自然】老宅长出了新榆树

□赵阿芳

假期回老家，我家的老院里，三棵榆树正绿得发亮。最大的那棵从平台楼梯下的下水道缝里钻出来，在水泥板下面横着爬了一米多，然后猛地昂起头，笔直地冲向天空——树干已有手腕粗了。另外两棵从水泥院子的裂缝里挤出来，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，晃得人心里一软。

弟弟看了看，说：砍掉吧，院子里长树，根扎深了会伤地基。

我犹豫着没有点头。不是舍不得那几棵榆树，是因为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母亲。

母亲不识字，但她说起榆树，却是可以长篇大论的。

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跟我们说过，挨饿那会儿，榆树可是救命的东西。榆钱撸下来拌上棒子面，能蒸窝头。

她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是平淡的，像在说一件平常的陈年往事。可我知道，母亲说的那种“饿”，是刻进她骨头里的。所以母亲对榆树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不仅是感激，更多的是敬重。

“榆树的命硬，”她说，“哪儿都能活。旱不死，涝不死，砍了根还能发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总是飘向远处，好像在看一棵我们看不见的榆树。

小时候我不懂这种感情。榆树村里到处都是，有什么稀罕的？它的花不好看，叶子也不漂亮，夏天还会生出那么多“波次毛”，沾到身上就火辣辣得疼上好几天。榆树木材倒是硬——可硬有什么好？从小就知道，“榆木疙瘩”是骂人的话，说的就是一个人笨、不开窍。

懂事以后，我觉得母亲就是一棵榆树。她生在荒年，三岁丧母，姥爷家穷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她性格倔强，这辈子都是那种“口拙”的人——从没听母亲说过一句漂亮话。父亲总是拿母亲打趣，说她这么好脾气，又这么倔强，真真是一块“榆木疙瘩”。可我的母亲，似乎很享受把她和榆树连在一起。“榆树有什么不好？”母亲从来不会给我们讲什么大道理，她用一辈子的行动诠释了骨子里的信念：榆树不起眼，不争抢，不抱怨，到哪儿都能活。

母亲健在的时候，没人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。她走了以后，我才慢慢发现，她教给我的那些东西，是任何课堂都学不到的——比如耐心，比如坚韧，比如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依然相信明天会好起来。这些，是榆树教会她的；而她，教会了我。

我想起我儿子考驾照那几年。他花了将近七年时间，前后换了两家驾校，光补考费就记不清交了多少。那段日子，我常常感到一种有心无力的绝望。每一次，当我快要爆炸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母亲。

我会想：母亲当年是怎样对她的孩子的——比如我。

我走路特别晚。别的孩子一岁就会走了，而我，一岁半才在大人的扶持下颤巍巍地“打战”，算是开始了学走路的启蒙。我差不多用

了别的孩子双倍的时光，才学会了走路。后来的后来，父亲常说：“你妈是咱们家的定海神针。你们一定要多跟你妈学，不要遇到事就慌了神。”当年众人为我走路发愁时，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地回一句：“俺闺女不就是学东西晚点吗？晚点就晚点吧。该会的将来都会，花开还有早有晚呢。”

我小学四年级开始要去另一个村子上学，途中经过我姥爷村。村里一个新媳妇有一次和回娘家的母亲偶遇，不知怎么说起了我：“姑，你村有个小闺女，在咱们村路过了三四年，一直是那么高，个子一点没动弹……”这个故事，是我长高后，母亲当笑话讲给我听的。“那你不怕我长不高吗？”我问母亲。“怕啥？有人早长，有人晚长。再说了，就是真长不高又咋了？个子也不能当饭吃。”

“晚长”——为了验证母亲预言的准确性，十七岁那年，我的身高突然猛蹿。半年的时间，从跑操最后排的一颗“小土豆”，直接长成了前排的“领头雁”。

五月的风从老村的方向吹来，带着榆钱的清香气。我和弟弟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三棵从水泥缝里长出来的榆树，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：不砍了。让它们长吧。长在这座空了的老院子里，长在母亲曾经走过无数遍的地方。它们是她的碑——不需要刻字的那种。

再过几年，也许院墙会塌，也许屋顶会漏，但那三棵榆树会越来越长越大。它们会把根扎进地基里，扎进墙缝里，扎进这片土地的深处。到那个时候，没有人记得这里住过谁——但榆树会记得。榆树的每一圈年轮里，都藏着一个不识字的母亲的故事：她如何在荒年里活下来，如何在苦难中守住善良，如何用一辈子的沉默，教给后人怎样做人做事。

前段时间去给社区居民做公益读书分享，来了很多年轻妈妈。她们问的问题几乎都一样：我的孩子坐不住怎么办？别人家的孩子都会了，他还在原地打转怎么办……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给大家讲个榆树的故事吧。”我讲了那三棵从水泥缝里长出来的榆树，讲了母亲怎样对待年幼的我，讲了我儿子学车的那七年。“每个孩子都是我们亲手播下的一粒种子。可现在，我们太着急了——急着让孩子开花，急着让孩子结果。真正的教育，不是催熟，是等待。是允许有的花开得晚，也要允许有的种子根本不开花——因为，你种下的那颗种子，它是一棵树。”

那天回家以后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想榆树，想我母亲，想那些被叫做“榆木疙瘩”的人和事。作为一位母亲，她相信一件事：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辰。时辰到了，自然就开了；时辰不到，急翻天也没用。

榆树，是母亲用她这一生，在心里种下的信念。

我给小榆树拍了几张照片，发给了远方的儿子。儿子回复：“这树是我姥的最爱呢。”

院门轻轻锁上了。身后，榆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——像一句古老的叮咛，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又传去很远的地方。

□王振华

出了巷口，顺着护城河走。河水是绿的，绿得发暗，像是陈年的碧玉，沉淀着多少年的时光。

两岸的柳树已经绿得鲜明了，一条条的柳丝垂下来，有的快要蘸到水里去。风一来，满树柳丝便摇摇摆摆的，像是谁家女子刚洗过的长发，湿漉漉地闪着光。

此刻，刘鹗笔下《老残游记》里的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被具象化了。济南泉水众多，老城居民院落内多有泉眼；而“垂杨”古指柳树，柳树喜水，与泉城环境相得益彰。

柳树是济南的市树，在市区分布极广。可每到这个季节，我们在欣赏泉水垂柳的诗意时，却也不得不承受柳絮的肆意飘飞。

作为一个已在济南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的“新济南人”，我也曾纳闷：济南为何种这么多柳树？

后来，一位老园林人给出了答案。

一株成年柳树每年可吸收281公斤二氧化碳，释放204公斤氧气，滞尘36公斤，净化空气能力显著；它生长迅速、适应性强，耐水湿、耐旱，发芽早、落叶晚，绿期长达10个月，适合北方城市快速成荫。柳树根系发达，常用于河岸、湖边绿化，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，且养护成本低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北方城市大规模种植柳树，视其为城市绿化的最佳选择。如今这些树大多已成林，若大规模砍伐替换，将造成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损失。由于生态效益远大于飞絮带来的短期困扰，北方诸多城市选择科学治理而非简单砍伐。

原来这些在春风里“调皮捣蛋”的白毛毛，竟是默默净化空气的“大功臣”。

你看，那光里有一点点的白，飘飘忽忽的，就是柳絮了。它们还不多，零零星星的，像是春姑娘信手撒下的几片碎纸，试探着这座城市对春天的态度。

越往南走，柳树越多，柳絮也渐渐稠密起来。它们不像雪，雪是沉的，落地便化；也不像棉花，棉花是实的，抓在手里有分量。

柳絮什么都不是，它们只是轻，轻得像是空气的梦，飘到哪里是哪里。有时一大团聚在一起，滚成小小的绒球，在地面上打着旋儿；有时又散开来，丝丝缕缕的，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
我在泉畔驻足，看这些飘忽的小东西。它们似乎没有目的，也没有方向，只是随着风，高一阵低一阵。有的飘到水面上，被泉水沾湿；有的挂在行人衣襟上，被带走了；有的就那么浮在空气里，不上不下，不前不后，仿佛时间在它们身上失效了。

泉水汨汨地冒着，那么从容，那么笃定，仿佛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都与它无关。柳絮飘到泉眼上方，被水汽一蒸，又轻盈地升上去，在半空中画着看不见的弧线。

和身边一位老人聊起柳絮。他说他小时候济南的春天，柳絮也是这样飘的，只是那时城里没有这么多车辆，柳絮就安安静静地落在地上，积成白白的一层，像是给大地铺了层毛毯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济南的柳絮



一个孩子跑过来，伸着小手去抓那些柳絮。柳絮却调皮得很，明明看着要抓到了，手一合，它却又从指缝间溜走了。孩子追着跑了几步，终于抓住一小团，小心翼翼地举到眼前看，然后又用力一吹，让那小小的茸毛重新飞起来。孩子笑了，笑得那样干净，那样纯粹，像是春天里最清亮的泉水。

或许柳絮就是为这些孩子准备的，让他们在还不懂得烦恼的年纪，先懂得一点追逐的快乐，就像追逐大大小小的肥皂泡。

顺着黑虎泉西路往解放阁方向继续走。夕阳的余晖把柳絮染成淡金色，它们飘在暮色里，像是谁在空中写下的散漫诗句，一个字一个字地，被风诵读着。

落到水里的，随着水流慢慢漂远；落到肩上的，轻轻一掸就不见了。它们来也无踪，去也无影，只在飘过的时候，让你觉得春天是真的深了。

有时候柳絮也很调皮，会钻进你的鼻孔，让你觉得痒痒的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——让人痒痒的，这就是春天的感觉。

一位环卫大姐拿着大扫帚，一下一下轻轻地把成团的柳絮拢在一起。可刚拢好，一阵风来，那些白的轻的小东西又四散开去，像是故意跟她作对。大姐也不恼，只是笑笑，继续扫。她说她在济南扫了十几年街，每年春天都要和柳絮打上几个月的交道。“扫不净的，”她说，“等它们闹够了，自己就消停了。”

这话说得有意思。柳絮在闹，春天在闹，整个济南城都在闹。闹过了，疯过了，夏天就来了。